



中国 社会 事实

二十世纪末的武汉：
人与社会（下卷）

副主编 徐炜 徐少舟
主编 罗教讲



WUHAN UNIVERSITY PRESS

武汉大学出版社

中国 社会 事实

二十世纪末的武汉：
人与社会（下卷）

副主编 徐炜 徐少舟
主编 罗教讲



WUHAN UNIVERSITY PRESS

武汉大学出版社

24. 武汉人的社会成就归因倾向研究

李强^① 罗教讲

一 归因与社会成就归因

解释人类行为因果规律的理论称为归因理论 (attribution theory), 它是社会心理学中重要的理论之一。

人类行为归因研究最早开始于 20 世纪 50 年代, 美国学者海德(F.Heider, 1958) 第一次发现了人际交往中归因推断的存在并系统地分析了这种归因的活动规律, 由此拉开了行为归因研究的序幕。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形成了归因研究的热潮。随着归因研究的深入, 不仅归因研究的领域不断扩展, 对归因理论的探索不断深入, 而且逐渐形成了主导归因研究方向的主流研究领域, 这就是成就归因研究, 其领军人物是美国社会心理学家韦纳(B.Weiner)。韦纳等人发展了海德传统的归因理论, 把它和 J·W·阿特金森的成就动机理论结合起来, 从而形成了成就归因理论(Weiner B,Rusell, D.Lerman.D,1979)。这种理论把人的成就归因分为内在归因(如能力、努力等)和外在归因(如环境、任务难度、运气与机遇等), 发现不同的个体对自己获得成就的归因存在显著性差异。

韦纳等人所建立的成就归因理论及其分析模型, 成为当时研究归因问题的权威理论与主要方法范式(Ajit K.Dslal 1988: 6-7)。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后, 随着认知心理学的兴起, 社会认知研究成为社会心理学中最活跃、最有影响力的领域(Robert S.Wyer,JR.Thomas K.Srull,1984:1-2)。社会认知研究进一步推动了归因理论的发展, 因为归因是社会认知的重要内容。社会认知视野下归因研究的一个重要发展, 是为社会学的社会心理学(SSP)研究归因问题打开了方便之门。传统的归因研究几乎是社会心理学(PSP)的一统天下, 研究者运用心理学方法(主要是实验室研究方法)研究个体行为归因问题。社会认知的客体是人的行为以及以人作为载体的社会现象或社会事实, 社会认知的主体不仅可以是个体、群体, 而且可以是社会公众。这就决定了我们不仅可以用实验方法研究个体或群体的社会认知, 而且可以运用社会学的方法(如问卷调查方法)测量与研究社会大众的社会认知(包括归因)问题(Morris Rosenberg & Ralph H.Turner 1990:26-30)。这种发展趋势, 我们从 1994 年美国新出版的《社会认知手册》中能更清楚地看出

^①李强: 武汉大学社会学系博士生。

(Robert S. Wyer, JR. Thomas K. Srull, 1994)。

我国的归因研究开始于 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而且其理论的探索 and 实验研究，几乎都是在韦纳 20 世纪 70 年代前后所形成的成就归因理论的分析框架内进行的，对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西方社会心理学在社会认知分析框架内进行的归因研究所知不多，这方面的中国本土研究则更少；就归因研究的内容来看，我国的归因研究绝大多数局限在与教育有关的狭窄领域，很少向其他领域拓展（杨治良，1998）。

客观地说，从 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我国已经开始了社会认知范式下的归因研究，钟毅平博士在《社会行为研究——现代社会认知理论与实践》一书中，比较系统地介绍和分析了西方社会认知与归因研究的发展与成果（钟毅平，1999）。我国台湾学者关秉寅、黄毅志运用社会学的社会心理学方法，通过问卷调查所获得定量资料的统计分析，研究了台湾公众的成就归因问题（关秉寅、黄毅志，1997:151-182）。

与传统归因研究不同，社会学的社会心理学的成就归因研究，社会认知主体不是个体而是社会大众；同样，社会认知或归因的客体也不是个体取得成就的原因，而是一定社会中一般大众取得成就的方式、途径或原因这样一种社会现象，即研究和分析一个社会中人们对一般公众取得成就原因的认知与解释。这种归因研究，不仅可以描述一个社会中社会大众的成就归因状况，解释影响人们成就归因产生的原因，而且我们还可以通过对社会公众成就归因状况的调查和测量，反过来反映出社会的运行状况，例如社会的公平状况。

把归因的对象确定为社会中人们取得的成就的途径或方法，我们称这种归因为社会成就归因，以区别于个体成就归因。社会成就归因就是社会公众对社会成员在一定社会条件下取得成就途径或方法的倾向性认知与解释。一般来说，不同的个体会存在不同的社会成就归因，但当我们把社会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时，社会成就归因就会表现出一定的倾向性和规律性。社会成就归因研究正是要发现和探索这种倾向与规律。

从社会层面来说，社会成就归因是社会运行状况的反映，或者说社会成就归因是社会运行状况的函数。我国台湾学者关秉寅、黄毅志对台湾社会成就归因的研究发现，台湾公众的社会成就归因倾向为：内在归因具有高度的一致性；教育归因也有相当的共识；而在结构归因上则分歧比较大。即台湾公众的社会成就归因倾向是，内在归因大于教育归因，教育归因又大于结构归因。形成这种社会成就归因倾向的原因是台湾社会的运行状况（关秉寅、黄毅志，1997:151-182）。我国大陆社会正处于转型时期，社会正在发生剧烈的变化，社会由封闭走向开放，由单一走向多元，人们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都在发生变化。在这样特殊的社会运行状态下，我国大陆公众的社会成就归因倾向，也会表现出自己的特性。

从个体的层面来看，具有不同特征、处于不同社会阶层的人们对成就

的取得会有不同的解释,即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社会成就归因倾向(M·H·邦德,1990:231-232)。对个体的成就归因,传统归因理论通过实验研究所得出的结论是:人们倾向于将自己的成功行为归结为内在原因(能力与努力),而把失败行为归结为外在原因(环境障碍、任务太难、机遇或运气不好)。而且,人们对自己行为的归因与对他人行为的归因存在明显的差异,即倾向于把别人的成功行为归结为外在因素(环境、运气),而把别人的失败行为归结为内在因素(无能力、不努力)(W·S·萨哈金,1991:509-522)。社会归因与个体归因的主要不同之处在于,个体归因的认知客体或对象是具体的,即自己的成就与失败或具体他人的成就与失败。而社会成就归因的对象则是社会成员取得成就这种带有一般性的社会现象,其内容的构成既包括认知主体自己成就的取得,也包括其他社会成员取得成就的途径与方式。显然个体归因与社会归因之间的内在联系,并可由个体归因研究的结论来推断社会归因的可能结果(Michael Argyle,1997:293-297)那就是,在社会中,成就的取得者通常就是那些收入比较高、向上流动、社会地位比较高、生活满意度也比较高的人们,他们倾向于把自己的成就的取得归因为内在因素(自己的能力与努力)。尽管他们存在把别人的成就归因于外在因素(关系与机遇等)的倾向,但我们有理由相信,在社会中取得成就越大者,其社会成就内在归因的倾向应该越强。与此相反,社会中的失败者,也就是那些收入较低、向下流动、社会地位和生活满意度都比较低的社会成员,他们存在把社会成就(别人取得的成就)归因于外在因素(关系与机遇等)的倾向。

台湾学者对台湾公众社会成就归因的研究已经在一定程度上验证了上述推断。处于转型时期的我国大陆社会不同于台湾社会,这种个体归因与社会归因之间的关系及其变化规律有待检验。

为此,我们确定本研究的理论假设如下:

假设1:男性与女性在社会成就归因上不存在显著性差异。

假设2:人们的年龄、受教育程度、收入水平、满意度都不影响其社会成就归因倾向。

假设3:在社会阶层体系中,职业地位与人们的社会成就归因倾向不存在显著性相关关系。

假设4:社会流动经历不影响人们的社会成就归因倾向。

二 研究的方法

(一) 资料来源

本文的数据来自于2000年武汉大学社会发展研究所受武汉市政府资助在武汉市完成的一项题为“武汉人、武汉文化与武汉经济发展研究”的研究课题。该课题一共在武汉市7个城区内随机抽取了39条街道,208个居委会,3088户居民进行入户问卷调查,最后获得的有效问卷为3009份,调

查对象是在武汉市生活、工作并具有武汉市户口的 18~65 岁的中国公民。

（二）变量测量

因变量的确定：

本研究的因变量是社会成就归因。我们用 8 项指标来测量公众的社会成就归因取向，即家庭背景或出身、社会关系网、机遇或运气、个人天赋、个人能力、个人努力、个人受教育水平、个人政治身份。在调查中，要求被调查者在上述 8 种因素中选出 3 项他们认为对于成就取得最重要的因素，每项因素选中为 1，不选为 0，在回归分析中因变量作二分变量处理。^①

自变量的确定：

本研究的自变量包括：

（1）性别，在回归分析中，作虚拟变量处理，男性为 1，女性为 0。

（2）年龄，为被调查者的实足年龄多少岁。

（3）本人受教育程度。在本研究中，我们用实际所受学校教育年数作为测量指标。

（4）本人年收入，分为 1 万元以下、2 万~3 万元、3 万~4 万元、4 万元以上 4 个等级，在回归分析中作虚拟变量处理。

（5）个人满意度。在本研究中，我们主要测量被调查者的“职业满意度”、“收入满意度”和“社会地位满意度”，并按“非常满意”、“比较满意”、“一般”、“不满意”、“很不满意”分别赋值 5、4、3、2、1 分，在回归分析中作为定距变量处理。

（6）本人职业与阶层地位。为了分析的方便，我们把众多类型的职业合并为 4 大类：管理干部（包括企业管理者）与知识工作者（简称“管、知”）、职员与个体私营业者（简称“职、私”）、工人、无一定职业者（包括下岗未就业者）（简称“无职”）。这里有两点需要说明，一是我们把职业作为阶层地位来对待，因而离退休人员不考虑在内；二是按大类划分阶层地位，因而按管理干部（包括企业管理者）与知识工作者、职员与私营业者、工人、无一定职业者（包括下岗尚未就业者）由高到低划分阶层地位^②。被调查者父亲职业与阶层地位，与本人职业与阶层地位测量方法相同。

（7）社会流动经历。在本研究中，我们运用代际职业流动指标测量被调查者的流动经历，即父辈职业与子辈职业的流动关系。在回归分析中，社会流动经历作虚拟变量处理，共 15 个虚拟变量，以“父无职子无职”为

① 台湾关秉寅、黄毅志测量成就归因的方法是用李克特式态度量表对各项因素的重要程度进行打分评价。我们认为这样做有可能导致量表中问题的分辨力下降，因为对于成就的取得来说，所列各种因素都是重要的，只是存在程度上的差别。因此要被调查者回答重要不重要时，他们可能回答都很重要。在所列因素中限制选出最重要的 3 项就不会出现这种情况，此时被调查者被迫进行因素的重要性排序。

② 按职业划分阶层地位，我们参照的是陆学艺主编《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 年版）中的研究成果。

基点0。

三 统计分析结果

(一) 基本资料分析

表 24-1 被访者成就归因频数分布表 (%) (N=3009)

比较而言,一个人在社会中取得成就,下列因素哪些更重要	相比之下更重要	相比之下次重要	合计
a.家庭背景或出身	27.3	72.7	100.0
b.社会关系网	37.5	62.5	100.0
c.机遇与运气	50.1	49.9	100.0
d.个人天赋	17.8	82.2	100.0
e.个人能力	55.1	44.9	100.0
f.个人努力	60.5	39.5	100.0
g.受教育水平	28.4	71.6	100.0
h.政治身份	3.6	96.4	100.0

把社会成就归因为“个人努力”人数最多(60.5%);其次是“个人能力”(55.1%);再次是“机遇或运气”(50.1%)。这三项因素在社会成就归因中一致性都超过50%。一致性稍低的社会成就归因因素依次是“社会关系网”(37.5%)、“受教育水平”(28.4%)和“家庭背景或出身”(27.3%),相比之下,人们认为最不重要的因素是“个人天赋”(17.8%)和“政治身份”(3.6%)。

我们把“家庭背景或出身”、“社会关系网”合并归类为“背景与关系归因”;把“个人天赋”、“个人能力”、“个人努力”合并归类为“能力与努力归因”;把“受教育水平”和“政治身份”合并归类为“教育与身份归因”;机会与运气称为“机会与运气归因”。之所以把教育与身份并列,是因为教育虽然与能力有关,但在当今社会,教育已经主要是一种身份的象征或身份符号,通过受教育所获得的学历和文凭是一个人进入社会重要位置、向上流动的必要条件(曲恒昌、曾晓东,2000:241-242)。^①

合并归类后得表24-2。^②

人们对社会成就的“能力和努力”归因意见最为一致(88.0%);其次

①合并归类的方法是被合并各项因素中凡有1项以上被选为“相比之下更重要(取值1)”者在合并项中被作为“相比之下更重要(取值1)”,其余皆视为“相比之下次重要(取值0)”。

②成就归因合并归类的依据是传统的成就归因理论与台湾学者的研究成果。传统的成就归因理论,把成就归因为能力与努力(内在归因)和环境、机遇与运气(外在归因)。台湾关秉寅、黄毅志把能力与努力作为内在归因,把背景关系、机遇与运气叫作结构归因,把教育单独列为教育归因。这就是说,关于成就归因的归类已形成了一定的模式,本文合并归类依据的便是这种模式。

是“背景与关系”归因（52.5%）；再次是“机会与运气”归因（50.1%）；最后是“教育与身份”归因（30.9%）。“能力与努力”归因被称为“内在归因”，而“背景与关系”、“机遇与运气”则称为“外在归因”。

表 24-2 4 种社会成就归因频数分布表（%） （N=3009）

社会成就归因类型	相比之下更重要	相比之下次要	合 计
背景与关系	52.5	47.5	100.0
能力与努力	88.0	12.0	100.0
机遇与运气	50.1	49.9	100.0
教育与身份	30.9	69.1	100.0

（二）多元回归分析

表 24-3 是对影响社会成就的“背景与关系归因”和“能力与努力归因”诸因素的多变量（logistic 回归）统计分析结果。

表 24-3 影响社会成就归因的多变量分析（logistic 回归）

自变量	背景与关系归因			能力与努力归因		
	模型 I	模型 II	模型 III	模型 I	模型 II	模型 III
性 别						
男	.138	.142	.153	-2.09	-.229	-.229
(女)						
年 龄	-.026***	-.023***	-.021***	.013*	.004	.002
受教育水平	-.085***	-.045*	-.042*	.080***	.034	.028
职业地位						
管理干部与知识工作者		-.485**	.939		.567*	-.918
职员与私营业者		-.356**	.386		.215	-.697
工人		-.145	.279		.424*	.666
(无一定职业者)						
收入水平						
(1 万元以下)						
1 万~2 万元		-.202	-.195		.280	.275
2 万~3 万元		-.333*	-.310*		.545*	.525*
3 万~4 万元		.261	.289		.053	.024
4 万元以上		-.246	-.199		1.646*	1.610*
满意度						

续 表

自变量	背景与关系归因			能力与努力归因		
	模型 I	模型 II	模型 III	模型 I	模型 II	模型 III
职业满意度		-.033	-.028		-.118	-.122
收入满意度		.076	.066		.062	.065
地位满意度		-.046	-.037		.261**	.263**
代际职业流动						
向上流动						
父职私—子管知			-1.180			1.879*
父工人—子管知			-1.133			1.789*
父工人—子职私			-.140			.902
水平流动						
父管知—子管知			-.977			1.514*
父职私—子职私			-.609			1.554*
父工人—子工人			.023			-.141
(父无职—子无职)						
向下流动						
父管知—子职私			-.445			1.021
父管知—子工人			-.046			-1.461
父管知—子无职			.550			.583
父职私—子工人			-.289			-1.65
父职私—子无职			.305			-.351
父工人—子无职			.416			-1.06
Constant	2.110**	1.915***	1.421*	.628	.429	.474
-2Log Likelihood	2905.307	2876.962	2865.94	1596.795	1556.551	1540.573
Chi-square	61.308***	89.653***	100.675***	15.431**	55.675***	71.653***
D • F	3	13	25	3	13	25

注: 1. * $p < 0.05$; ** $p < 0.01$; *** $p < 0.001$

2. 自变量括号中的类别为参照省略项, 即基点项。

1. 背景与关系归因分析

性别对背景与关系归因不存在显著性影响 ($p > 0.01$)。

年龄和受教育水平都对背景与关系归因存在显著性影响作用, 且回归系数都取负值, 表明年龄轻者较之年长者更倾向于背景与关系归因; 受教育水平越低越倾向于背景与关系归因。同时, 年龄和受教育水平两个变量

对背景与关系归因的影响在有无其他变量作用的情况下一样显著。在模型 I 中，只控了性别因素，年龄和受教育水平对背景与关系归因的影响都非常显著 ($p < 0.001$)；在模型 II 和模型 III 中，当分别控制了职业、收入、满意度和代际职业流动经历后，影响作用仍然显著。这表明年龄和受教育水平对背景与关系归因的影响作用非常强烈，其作用不因其他变量的作用而有所减弱。在模型 II 中，职业地位和收入水平对背景与关系归因的影响都具有显著性，且其回归系数都为负数，表明职业地位越低越倾向于背景与关系归因；收入水平越低越倾向于背景与关系归因。但在模型 III 中，当引入代际职业流动即控制了代际职业流动变量后，职业地位对背景与关系归因的影响显著性消失，只有收入水平的影响仍然显著，且回归系数仍取负值，因而可以说，收入水平低者比收入水平高者更倾向于背景与关系归因；而职业对背景与关系归因的影响则是通过代际职业流动这一自变量的作用而表现出来的，当把代际职业流动这一自变量控制后，职业地位对背景与关系归因的影响显著性消失，且其回归系数均由原来的负值变为正值。

2. 能力与努力归因分析

性别变量对能力与努力归因不存在显著性影响作用 ($p > 0.01$)。

在模型 I 中，年龄和受教育水平都对能力与努力归因作用显著，回归系数取正值，表示年龄越大、受教育水平越高越趋向于能力与努力归因。但当在模型 II 和模型 III 中引入其他自变量时，即当把其他自变量进行控制后，年龄和受教育水平对能力与努力归因的影响显著性都消失，表明这两个变量与其他变量在模型中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具体说来就是，年龄和受教育水平这两个自变量对能力与努力归因的显著性作用是通过其他自变量如职业、收入、满意度以及代际职业流动等的作用而表现出来的。教育水平与年龄和上述其他自变量存在较强的线性相关关系，即年龄越大受教育水平越高的人，其职业地位、收入水平以及满意度都会越高，其向上代际职业流动的可能性也会更大。同时，职业地位与代际职业流动也存在这种情况。在模型 II 中，职业地位对能力与努力归因的影响具有显著性，但当在模型 III 中把代际职业流动这一自变量控制后，职业地位的显著性消失，表明职业地位对能力与努力归因的影响主要是通过代际职业流动的影响而产生的。

因此，我们可以说，对能力与努力归因真正存在显著性影响作用的是收入水平、地位满意度和代际职业流动。

收入水平对能力与努力归因影响的回归系数取正值，表明收入水平高者比收入低者更倾向于把成就的取得归因为能力与努力。而且，收入水平越高，这种归因倾向越强烈。收入水平为 1 万~2 万元者倾向于能力与努力归因的概率强度是收入 1 万元以下者的 1.725 倍 ($e^{0.545}$)；而收入 4 万元以上者能力与努力归因倾向的概率强度则是收入 1 万元以下者的 5.186 倍 ($e^{1.646}$)，是年收入 2 万~3 万元者的 3.007 倍 ($e^{1.646-0.545}$)。

在满意度中,只有地位满意度对能力与努力归因的影响存在显著性($p<0.01$),其他两种满意度,即职业满意度和收入满意度都不显著。地位满意度回归系数取正值,表明对自己的地位越满意的人们越倾向于把成就归因个人的能力与努力。

代际职业流动和能力与努力归因的关系也很能说明问题。只有代际职业向上流动和水平流动经历才对人们的能力与努力归因存在显著性影响作用,向下流动经历对能力与努力归因不存在显著性影响。向上流动变量回归系数取正值,表明向上流动幅度越大,越倾向于成就的能力与努力归因。至于水平流动对能力与努力归因影响的显著性,则与父辈职业地位的高低有关,即父辈职业地位越高者,越倾向于能力与努力归因。实际上,也就是子辈的职业地位越高,越倾向于成就的能力与努力归因。

表 24-4 是对机遇与运气归因和教育与身份归因影响因素的 Logistic 回归分析的结果。

表 24-4 影响社会成就归因的多变量分析(logistic 回归)

自变量	机遇与运气归因			教育与身份归因		
	模型 I	模型 II	模型 III	模型 I	模型 II	模型 III
性 别						
男	-.134	-.142	-.143	-.175	-.175	-.175
(女)						
年 龄	-.014***	-.016***	-.015**	.014**	.007	.006
受教育水平	.039**	.032	.035	.056***	.024	.022
职业地位						
管理干部与 知识工作者		-.232	.163		.372*	.088
职员与 私营业者		-.298*	.854		.061	-1.473
工人		-.204	.419		.087	-.579
(无一定职业者)						
收入水平						
(1 万元以下)						
1 万~2 万元		.216*	.233*		.109	.090
2 万~3 万元		.188	.217		.076	.055
3 万~4 万元		.335	.356		-.124	-.135
4 万元以上		.402	.392		-.228	-.218
满意度						
职业满意度		.022	.029		-.003	-.008

续 表

自变量	机遇与运气归因			教育与身份归因		
	模型 I	模型 II	模型 III	模型 I	模型 II	模型 III
收入满意度		.076	.078		.032	.033
地位满意度		-.124*	-.136*		.058	.061
代际职业流动						
向上流动						
父职私—子管知			-.458			-1.43
父工人—子管知			-.231			-.256
父工人—子职私			-1.04			.935
水平流动						
父管知—子管知			-.185			-.386
父职私—子职私			-1.022			-.831
父工人—子工人			-.357			-.006
(父无职—子无职)						
向下流动						
父管知—子职私			-.958			1.049
父管知—子工人			-.746			.367
父管知—子无职			.140			-.734
父职私—子工人			-.549			-.029
父职私—子无职			-.061			-.583
父工人—子无职			.305			-.626
Constant	.261	.585	.348	-1.988***	-1.759***	-1.111
-2Log Likelihood	2940.512	2924.423	2913.013	2595.539	2581.891	2573.264
Chi-square	32.059***	48.148***	59.558***	19.819***	31.467***	42.094*
D • F	3	13	25	3	13	25

注：1. * $p < 0.05$ ；** $p < 0.01$ ；*** $P < 0.001$

2. 自变量括号中的类别为参照省略项，即基点项。

3. 机遇与运气归因分析

性别对机遇与运气归因不存在显著性影响 ($p > 0.05$)。

年龄和机遇与运气归因存在显著性相关关系，且回归系数取负值，表明年纪越轻者越倾向于机会与运气归因。收入水平对机遇与运气归因的显著性影响仅限于收入较低（年收入 1 万~2 万元以下）的阶层，且回归系数取正值，表明在低收入阶层内，收入相对高者较之更低收入者更倾向于机遇与运气归因，如年收入 1 万~2 万元者，其倾向于机遇与运气归因的概率强度是年收入 1 万元以下者的 1.262 倍 ($e^{0.233}$)。其他较高收入阶层（年收入 2 万~3 万元、3 万~4 万元以及 4 万元以上），其收入水平对机遇与运气

归因不存在显著性作用。这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即看重机遇与运气的,不是收入比较高的人,也不是收入最低者,而是那些收入比较低的人们。由此出发,我们似乎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收入比较高的人不会把社会成就归结为机遇与运气,因为成功使他们充满自信;而那些处于社会最底层的人们也不看重机遇与运气,因为他们所处的地位使得他们对自己已经完全失去信心,连通过碰机遇和好运侥幸改变自己命运的奢望都不复存在;只有那些地位相对较低,但对未来仍抱有希望的人们,才真正看重机遇和运气对获得成功、改变自己命运的作用。应该说,这是符合社会实际的研究结论。人们的地位满意度也与机遇与运气归因存在显著性关系,且回归系数取负值,表明地位满意度低者比地位满意度高者更倾向于成就的机遇与运气归因。

4. 教育与身份归因分析

对于教育与身份归因,性别因素同样不存在显著性影响作用($p > 0.01$)。

在完全模型(模型 III)中,在控制了其他变量影响的情况下,所有自变量单独对教育与身份归因都不存在显著性影响作用。只有在不完全模型(模型 I 和模型 II)中,即在只控制部分变量的情况下,年龄、教育水平以及职业地位对教育与身份归因才表现出显著性作用。这表明教育与身份归因在社会成就的 4 大归因类型中所占的份量最轻,亦即在当代社会中,人们认为教育与身份在个人成就的取得中,其作用相对而言比较小。

比较表 24-3、表 24-4 中影响 4 种归因的因素,容易发现,影响内在归因与其他归因的因素是不一样的,特别是其影响的方向和程度存在明显差别。以自变量年龄对社会成就归因的影响为例。年龄对内在归因(能力与努力归因)及教育与身份归因的影响均不显著($p > 0.05$),但对外在归因(背景与关系归因、机遇与运气归因)却存在非常显著的作用($p < 0.001$),且回归系数取负值,表明年龄小的人比年龄大的人更倾向于社会成就的背景与关系归因及机遇与运气归因。年龄与外在归因取向的这种关系,一方面是地位低者比地位高者更倾向于外在归因这一结论的具体表现,因为就社会总体而言,人们的年龄与地位的高低呈现出一种正相关关系,即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们的地位会不断提高;另一方面,也是年纪轻者比年长者对社会反应更敏锐且具有更强烈批判性的一种反映。

此外,从表 24-3、表 24-4 还可以看出,对所有回归模型中回归系数的 X^2 检验都具有显著性,表明模型中的自变量对因变量的作用显著。但是,各整体模型检验的 -2Log Likelihood 取值均比较大,表明模型的拟合程度比较差。这可能与样本量比较大、自变量和因变量的类型比较复杂有关,好在这并不影响我们对自变量与因变量关系的解释^①。

^①台湾关秉寅、黄毅志的研究也出现了类似情况,他们用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数据,其模型的决定值 R^2 均很小,内在归因的 R^2 值只有 0.06,结构归因与教育归因的 R^2 值分别为 0.023 和 0.04,这表明模型的拟合度较差,或者说模型中自变量所能解释因变量的

四 结论

总结前文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基本研究结果：

1. 性别因素对社会成就归因不存在显著性影响，男性与女性在4种社会成就归因中都不存在显著性差异。

2. 年龄小者比年龄大者更倾向于背景与关系归因；受教育水平低者比受教育高者更倾向于背景与关系归因；收入水平低者比收入水平高者更倾向于背景与关系归因。

3. 收入水平越高者越倾向于能力与努力归因；地位满意度越高者越倾向于成就的能力与努力归因；代际职业向上流动者更倾向于能力与努力归因；父辈具有较高职业地位的代际水平流动者更倾向于成就的能力与努力归因。

4. 年纪小的人比年纪大的人更倾向于成就的机遇与运气归因。社会地位满意度越低者越倾向于把成就的取得归因为机遇和运气。

5. 各个自变量对教育与身份归因均不存在显著性影响。

对照前文提出的虚无假设，我们得出如下结论：

其一，接受虚无假设1，即性别不是影响社会成就归因的因素，男性和女性在社会成就归因的四个方面都不存在显著性差异。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发现。我们有理由认为，这种结果正是中国社会倡导男女平等观念、实行男女平等社会政策的结果和具体体现。传统的成就归因理论认为，强势群体、成功者更倾向于社会成就的内在归因，而弱势群体、失败者则更倾向于社会成就的外在归因。按照传统的性别观念，男性是社会中的强势群体，女性是弱势群体，男性比女性更容易取得成就。因此，男性与女性应该具有不同的社会成就归因倾向，即男性会更倾向于社会成就的内在归因，而女性则会比男性更倾向于外在归因。台湾的研究结论也证明了女性与男性在社会成就归因方面存在显著性差异（关秉寅、黄毅志，1997：180）。男性与女性在社会成就归因上不存在显著性差异，这正是我国大陆社会不同于台湾社会的具体表现。

其二，对于假设2，除了教育变量外，年龄、收入、满意度都与社会成就归因存在相关关系。因此，可以拒绝假设2，即具有不同年龄、不同收入水平、不同满意度的人们具有显著不同的社会成就归因倾向。按常理，教育程度与年龄、收入、满意度都应该与社会成就归因存在相关。台湾的研究结果表明，受教育水平与社会成就归因存在显著性关系（关秉寅、黄毅志，1997：180）。教育程度变量对社会成就归因的影响与年龄、收入和满意度不一样，可能与我国大陆社会转型期人们的受教育水平、年龄、收入

变异量比较小。对此，关、黄的解释是：这种结果并不令人意外，因为台湾地区民众对于成就归因有高的共识， R^2 自然就会很低，而且与他人的同类研究（如 Kluegel and Smith 以及 置海源和蔡淑铃）的发现很类似。因此，回归模型的拟合度低并不影响对自变量与因变量关系的正确认知（关秉寅、黄毅志，1997：174）。

及满意度之间的复杂关系有关,具体情况有待进一步研究。

其三,职业地位低的人比职业地位高的人更倾向于社会成就的外在归因(背景与关系、机遇与运气);而职业地位高者则比职业地位低者更倾向于社会成就的内在归因(能力与努力)。由此我们可以拒绝虚无假设3而接受被择假设,即人们的职业地位与社会成就归因之间存在显著性相关关系。这与台湾学者研究得出的结论是一致的(关秉寅、黄毅志,1997:180)。

其四,向上流动者比向下流动和水平流动者更倾向与社会成就的内在归因,更不倾向于外在归因;而且水平流动者比向下流动者更倾向与社会成就的内在归因,更不倾向于外在归因。由此我们可以拒绝虚无假设4而接受被择假设,即社会流动与社会成就归因之间存在显著性相关关系。台湾学者的研究结论也是如此(关秉寅、黄毅志,1997:180)。

本文是一项社会学的社会心理学(SSP)研究,其目的是要从更一般的意义上证明社会心理学中关于成就归因规律的普遍性。西方社会心理学中对成就归因的研究大都是在实验室里进行的。本文把成就归因置于一个更为广阔的社会背景中,即把社会成就(社会成员成就的取得)归因作为一种社会现象进行研究。在这里,归因的对象是社会成就,归因的主体是社会大众,社会中的地位高者代表成功者,而地位低者则代表失败者,人们对社会中一种普遍存在的社会现象——社会成就(他人成就也包括自己的成就)取得的原因进行总结和归纳。有意义的是,本研究得出的研究结论,与西方学者在实验室条件下的研究结果是一致的。由此证明了成就归因的心理倾向或心理规律的普遍存在,不仅由实验室研究推广到现实社会研究,其规律依然存在,而且西方人与处于社会转型期的东方中国人(包括台湾人)均表现出同样的心理倾向和规律性。从研究方法的意义,我们发现,运用心理学的社会心理学(PSP)方法和社会学的社会心理学(SSP)方法研究同一对象时,得出的研究结果是一致的。

参考文献

- [1]Heider F. The Psychology of interpersonalrelations[M]. New York, Wiley, 1958.
- [2]Weiner B, Rusell, D. Lerman. D. The cognition emotion process in achievement related contexts[M].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979: (1211-1220).
- [3]Ajit K.Dslal. Attribution Theory and Research[J]. Wiley Eastern Limited, 1988: (6-7).
- [4]Robert S. Wyer, JR. Thomas K. Srull. (1984) Handbook of Social Cognition, Volume 1, 1-2, Lawrence Erlbraum Associates, Inc.
- [5]Morris Rosenberg & Ralph H. Turner (1990) Social Psychology: Sociological Perspectives Transaction Publishers.
- [6]Robert S. Wyer, JR. Thomas K. Srull, (1994) Handbook of Social Cognition, Volume 1 and Volum 2, Lawrence Erlbraum Associates, Inc.

- [7]杨治良. 归因理论及其应用[M]. 济南: 山东人民出版社, 1998.
- [8]钟毅平. 社会行为研究——现代社会认知理论与实践[M]. 长沙: 湖南教育出版社, 1999.
- [9]J·P·福加斯. 社会交往心理学——人际行为[M]. 长沙: 湖南出版社, 1992.
- [10]W·S 萨哈金. 社会心理学的历史与体系[M]. 贵阳: 贵州人民出版社, 1991.
- [11]M·H·邦德. 中国人的心理[M]. 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 1990.
- [12]Michael·Argyle. 社会阶级心理学[M]. 台北: 台湾远流公司出版, 1997.
- [13]曲恒昌, 曾晓东. 西方教育经济学研究[M]. 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0.
- [14]关秉寅, 黄毅志. 台湾社会民众对成就归因及分配政策之态度[M]. 台北: 台湾“中央研究院”社会学研究所出版, 1997.
- [15]张荳云, 吕玉瑕, 王甫昌. 九十年代的台湾社会——社会变迁基本调查研究系列 二(上)[M]. 台北: 台湾“中央研究院”社会学研究所出版, 1997.

25. 社会信任：以武汉为背景的一种解说

李一川^① 罗教讲

一 社会信任及其研究

人与人之间的信任是一个古老的话题，人们对它的关注和思考由来已久。但用现代社会科学的方法对信任问题进行系统分析和研究，而且不同学科从不同的角度探索信任问题，则是最近几十年的事情。

最早研究信任问题的是社会心理学家。20世纪50年代，美国社会心理学家多伊奇（Deutsch）用实验方法研究了人际信任问题，这算是开了对信任问题进行科学研究的先河（Deutsch, 1958）。在此后的几十年内，信任问题逐渐成为心理学、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法学、管理学等众多学科关注的热门问题。不同学科以不同的视角，从不同的侧面，对信任的产生、发展、结构、功能、机制以及信任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等多种问题进行了全面的研究，取得了丰富的研究成果。

人们热衷于研究信任问题，是世界经济、社会发展所产生的必然结果，或者说是全球化运动在学术界引起的一种积极反应。全球化所引起的人类社会的众多变化之一，是人类交往方式的革命。“地球村”的形成，互联网的出现与普及以及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电子商务等，促使人们必须用新的眼光和方法去审视和研究信任这个自人类产生以来就存在的古老问题。

我国学术界研究信任问题，除了受国际学术发展的影响之外，另外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我国学术界力图反驳并推翻外国研究者对中国人和中国社会在信任问题上所得出的贬损结论。

19世纪至20世纪初期，一批西方传教士和研究中国的西方汉学家，在其著作中有意无意地说出诸如中国人不信任家族以外的人、中国社会缺乏诚信之类的言论。如受到鲁迅先生重视的、由传教士史密斯撰写的《中国人的气质》一书，就直言不讳地指出不诚实和互不信任是中国人的两大特点。连马克斯·韦伯都写道：“所有到过中国的观察家都证实，中国人之间存在明显的不信任，这与基督教文化中人们普遍的信任和诚实构成鲜明的对比。”（马克斯·韦伯，1995）。沙莲香教授所著《中国民族性》一书中列述了大量类似的言论。

这些言论我国学术界是清楚的，也基本上是认可的。因为大家都认为

^①李一川：武汉大学社会学系博士生。